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城乡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尚子娟¹ 迟佰慧²

(1. 长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4; 2. 长安大学 人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4)

摘要:人口的乡—城转移导致了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人口的单向跨区域流动也造成了我国大范围地区年龄结构失衡,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造成威胁。基于2010—2019年大陆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以人口老龄化系数为被解释变量,分别构建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从人口、经济、社会三个方面研究我国城镇、农村人口老龄化和城乡倒置现象的影响因素以及三类因素在东、中、西部地区的不同表现。结果显示,人口因素是老龄化城乡差异的直接原因,经济因素是根本原因,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因素在城乡、区域之间影响不一。为此,政府应当增强生育支持力度以提高生育率,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推动农村地区的养老服务建设,并鼓励区域的联动合作,以缓解老龄化集聚地区的人口压力。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C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3)04-0066-11

doi:10.19742/j.cnki.50-1164/C.230407

一、引言

2000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达7%,标志着我国正式步入老龄化社会^[1]。进入新时代,我国老龄化进程不断加速,城乡差异也进一步凸显。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的推进,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涌向城市,导致城乡人口年龄结构的差异日益明显。根据《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10至2019年,我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由8.87%增长至12.57%;其中,城镇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从7.80%增长至11.20%,农村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则从10.06%增长至14.69%。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我国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在总体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同时,城乡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差距也呈扩大趋势,较之城市,农村地区的老龄化程度更深,增速更快。这种差异会为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一系列问题,比如农村空心化问题,农村留守老人养老问题,城乡养老资源分配不均问题,城乡经济水平差距加大问题等。2022年5月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

收稿日期:2023-04-25

作者简介:尚子娟(1985—),女,山西运城人,西安交通大学博士研究生,长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人口与社会治理。

迟佰慧(1999—),女,山东日照人,长安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人口与社会治理。

基金项目:201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生育支持政策试点效果跟踪评估与生育友好型社会构建研究”(19ARK004);2021年度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陕西省托幼公共服务体系及政策创新研究”(2021F002)。

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提出要引导人口流失县城转型发展,这说明人口单向迁移、部分地区人口流失严重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决策者的重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未富先老”的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一问题不仅成为政策制定者的重要议题,也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和探讨。

城乡二元结构下,伴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城乡之间社会经济差异使城乡人口老龄化表现出不同特点,整体上均向扩张和深化的方向发展,但农村老龄化形势更加严峻^[2]。刘华军、刘传明认为农村人口老龄化与城镇化之间存在着双向影响机制:农村青壮年人口向城市转移,在减缓城镇地区老龄化增势的同时,也加剧了农村的老龄化程度,使得老龄化城乡差距扩大^[3],并且伴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农村地区生活水平提高,医疗条件改善,人口预期寿命延长,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同时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又会反过来阻碍城镇化进程^[4]。针对在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还远低于城镇的情况下,其人口老龄化水平却高于城镇的现象,杜鹏最早进行相关研究,并将其定义为“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10],即农村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高于城镇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张伟等人通过研究发现,我国在2000年之前尚未出现城乡倒置现象,2000年至2015年,城乡倒置现象出现并迅速扩展,2015年以后,已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普遍现象^[6]。学者们从不同的时空视角研究我国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的原因和影响因素,所得结果不一,但就“人口因素是直接影响因素,经济因素是根本影响因素”这一观点,基本上可以达成共识^[7-8]。杜鹏、朱勤等学者均认为乡-城单向人口迁移是造成老龄化城乡倒置的主要原因,城乡之间的发展差异,吸引青壮年人口从农村向城镇流动,造成城乡之间年龄结构的失衡^[3]。但从长远来看,城镇吸纳人口的能力将趋于饱和,而随着城镇化浪潮进入城镇生活的农村青壮年人口步入老年后,城镇的老年人口将急速上升,城乡倒置将发生逆转,未来城镇将面临巨大的养老压力^[9]。

关于老龄化城乡差异的既有研究多聚焦于城乡差异对城乡规划和城镇化建设的影响,以及城乡倒置的时空演变特点,对于影响因素的探究较少。本文拟使用省级面板数据对我国城乡人口老龄化及城乡倒置现象的影响因素展开研究,并按照三大区域分组探讨区域差异,以期找出城乡人口老龄化的共性和个性,并以此为据,为统筹城乡发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出政策建议。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以2010年第六次和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为时间节点,选取了两次人口普查之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研究。通过对2010到2019年十年间的面板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将城镇人口老龄化系数、农村人口老龄化系数、城乡倒置度作为因变量,分别构建回归模型,探讨城乡人口老龄化的差异及影响因素。

(一)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我国的31个省级行政单位(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为研究对象,时间跨度为2010年至2019年,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1—2020)》《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11—2020)》以及国家统计局网站。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为了更好地研究城乡差异,本文参考前人研究,将统计年鉴中关于“城市”和“镇”的数据合并为“城镇”^[10],作为城镇人口老龄化的基础数据。此外,由于部分数据缺失,为了减少对分析结果的影响,本文使用线性插值法进行补缺处理。

(二) 指标选取

通过对既有文献的梳理和参考,本文选取人口老龄化系数为被解释变量,用来衡量人口老龄化程

度;解释变量则涵盖人口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三个方面,并下设二级指标,以此指标体系构建模型,展开对城乡人口老龄化差异的研究。

1. 人口老龄化衡量指标

参照前人研究,本文选取人口老龄化系数,即 65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值,来衡量城乡老龄化程度。当比值小于 5%,表明该区域尚未进入老龄化社会;比值大于 7%,说明该区域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比值大于 13%,则意味着该地区进入超老龄化社会^[11]。为比较城乡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差异,本文借用张伟^[6]等学者提出的“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度”指标,即农村人口老龄化系数与城镇人口老龄化系数的差值。相对于农村地区而言,城镇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更高,医疗设施更为完善,期望寿命更高,其预期的人口老龄化水平也应该更高,因而城镇老龄化程度低于农村是一种违背理论预期的“倒置”现象。伴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中国自 2000 年开始出现城乡倒置现象,并呈持续加剧趋势^[12]。我国 2010—2019 年城乡人口老龄化系数及城乡倒置度详见图 1。综上所述,在本文中,人口老龄化程度由城镇人口老龄化系数、农村人口老龄化系数、城乡倒置度来表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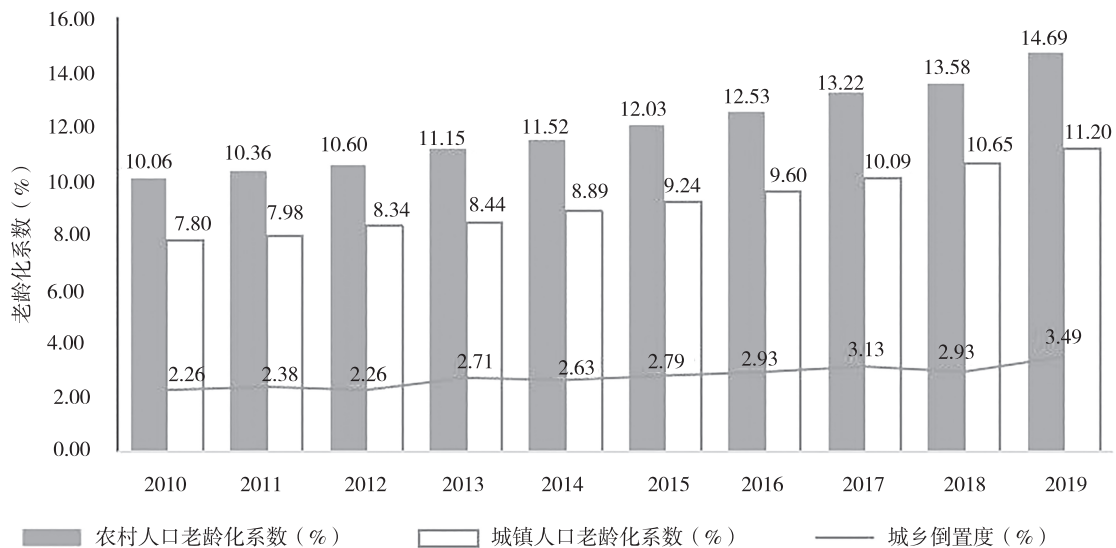


图 1 2010—2019 年城乡人口老龄化系数及城乡倒置度

2. 影响因素指标

人口老龄化是受多种因素综合作用影响的,本文将这些因素归类为人口、经济和社会三个层面,其中社会因素又进一步分为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因素。对于城镇人口老龄化系数、农村人口老龄化系数、城乡倒置度三个因变量,影响因素的指标体系大致相同,二级指标因数据可得性等原因略有差异,详见表 1。人口因素对人口老龄化有最直接的影响,其中人口出生率和人口死亡率是最主要的因素,可以反映人口自然变动情况。经济因素会影响人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从而影响区域的平均预期寿命;不同区域之间存在经济差异,人们出于求职、求学等原因,会发生人口迁移活动^[13],这些因素都会对该区域的年龄结构变动造成影响。社会因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区域人口受教育程度,以 15 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表征^[11],二是医疗卫生条件,以每万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表征^[14-15];三是社会保障情况,以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占总人数的比重来表征。需要予以说明的是,在城镇人口老龄化影响因素指标中,城镇登记失业率是指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与城镇各类就业人员、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之和的比值;而城乡倒置度的影响因素之一城镇化水平,是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16]。

表 1 人口老龄化系数的影响因素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城镇人口老龄化系数	人口因素	城镇老年人口抚养比(%)	
	经济因素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元)	
	教育	城镇登记失业率(%)	
		城镇 15 岁以上人口文盲率(%)	
	医疗	城镇每万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张)	
		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占总人数比重(%)	
	社会保障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万元)	
		城镇职工参加养老保险人数占城镇 15 岁以上人口的比重(%)	
	人口因素	农村老年人口抚养比(%)	
农村人口老龄化系数	经济因素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经济因素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元)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亿元)	
	教育	农村 15 岁以上人口文盲率(%)	
		农村每万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张)	
	医疗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占总人数比重(%)	
		社会保障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占总人数比重(%)
	人口因素	人口出生率(‰)	
	城乡倒置度	人口因素	人口死亡率(‰)
		人口因素	老年人口抚养比(%)
城镇化水平(%)			
经济因素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人)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值(元)	
经济因素		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差(元)	
		教育	城乡 15 岁以上人口文盲率差值(%)
医疗		城乡每万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差值(张)	
		社会保障	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占比差值(%)

(三) 模型构建

以城镇人口老龄化系数、农村人口老龄化系数、城乡倒置度为因变量,分别对面板数据进行分析:通过检验个体效应,发现对三个模型而言,固定效应(FE)均优于混合回归(OLS);时间效应检验结果表明,随机效应(RE)也优于混合回归(OLS);最后进行豪斯曼检验,结果显示,对城镇和农村人口老龄化影响因素而言,固定效应优于随机效应,而对于城乡倒置度的影响因素,随机效应优于固定效应。因此,城镇和农村人口老龄化影响因素模型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城乡倒置度影响因素模型选择随机效应模型。基准模型如下:

$$Y_{i,t} = \alpha + \beta X_{i,t} + \mu_i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 Y 为被解释变量,即人口老龄化系数; X 代表解释变量,包括前文所述人口、经济、社会三个方面的变量; α 和 β 为待估计参数; ε 为随机误差项; i 和 t 分别表示省份和年份。

三、结果与分析

我国国土面积广阔,人口众多,区域社会和经济水平差距较大,人口老龄化的表现呈现区域差异性^[13]。为更加具体地探讨我国老龄化的城乡差异和影响因素,在选定面板数据分析方式之后,本文将我国 31 个省市按照地理位置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进行分组回归,分地域探讨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

(一) 城镇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

以城镇人口老龄化系数为被解释变量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详见表 2。

表 2 城镇人口老龄化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

变量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系数	标准误	P 值	系数	标准误	P 值	系数	标准误	P 值	
人口因素	城镇老年人口抚养比	0.337***	0.035	0.000	0.274***	0.044	0.000	0.278***	0.036	0.000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0.000*	0.000	0.090	0.000	0.000	0.408	0.000	0.000	0.659
经济因素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0.000	0.000	0.308	0.000	0.000	0.797	0.000*	0.000	0.059
	城镇登记失业率	0.508*	0.298	0.092	0.026	0.267	0.923	0.063	0.213	0.769
	城镇文盲率	0.176	0.138	0.205	0.017	0.190	0.929	0.014	0.026	0.596
	城镇每万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0.004	0.008	0.667	0.013*	0.008	0.093	0.003	0.004	0.502
社会因素	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比重	-0.242*	0.143	0.094	-0.103	0.135	0.449	0.178**	0.083	0.034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0.000*	0.000	0.075	0.000	0.000	0.549	0.000	0.000	0.932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参保人数比重	0.003	0.005	0.572	0.007	0.008	0.402	0.007	0.006	0.215
	常数	1.799	1.325	0.178	3.520	2.125	0.103	1.015	1.314	0.442

说明: *、**、***分别表示 $p < 0.10$ 、 $p < 0.05$ 、 $p < 0.01$ 。

城镇老年人口抚养比,即城镇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的比值,对城镇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最为突出,在三大地区均表现为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人口因素是影响老龄化的最直接因素,我国人口出生率多年维持在低水平状态,而随着生活质量的不断改善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持续进步,人口预期寿命延长,人口年龄结构逐渐失衡,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分别只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有显著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地区间的经济社会发展存在差异:东部地区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中、西部地区,社会思想更加开放,居民倾向于追求高质量的生活,积极获取资源满足自身的各种需要,从而有助于延长预期寿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物价水平相对较低,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意愿较低,如果部分居民消费支出较高,那么可以推测其具有较高的收入水平和较强的追求高质量生活的意愿,这种意愿和行为均有利于预期寿命的延长。城镇登记失业率仅在东部地区对城镇人口老龄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是由于东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和工业化水平高于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的就地城镇化占据较大比例,即只是通过改变居民户口性质实现城镇化,实际上该区

域的经济发展和 社会管理水平并未达到自然城镇化的标准,因而就业和失业登记工作也存在不足。这其实是再次印证了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对城镇人口老龄化的影响。

在社会因素中,区域人口受教育程度指标——城镇文盲率在三个地区均无显著影响,说明在城镇地区,居民受教育程度对人口老龄化没有直接影响或者明显的间接影响。当然,这也可能是由于城镇居民总体受教育程度较高,文盲率无法准确表征其教育水平。代表医疗水平的城镇每万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仅在中部地区对城镇人口老龄化表现出显著影响,这是因为东部地区医疗水平较高,医疗资源较为集中,居民就医比较方便;西部地区医疗水平较低,医疗资源较为匮乏,居民的医疗需求难以得到满足,而中部地区的医疗条件处于二者之间,且区域间差异较大,医疗水平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更为突出。医疗卫生条件直接决定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良好的医疗卫生条件能够为居民提供更加优质的医疗服务,延长人的预期寿命。应当予以关注的是,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的比重在东、西部地区对城镇人口老龄化发挥着相反的作用:在东部地区产生负向影响,而在西部地区则呈正相关关系。原因如下: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就业机会多,吸引大量青壮年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求学、求职,在享有最低生活保障的居民中,更多的是无劳动能力的人和失业的外来流动人口,老年人口占比较小;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对外地居民无吸引力,本地青壮年劳动力也大量流失,向中、东部迁移,因此老年人口在总人口和低保人口中都占据着较大比例。象征社会保障水平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参保人数比重在三个地区影响均不显著,而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仅在东部地区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养老保险基金支出越多,表明职工的晚年待遇越好,预期寿命可以因之延长。

(二)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

农村人口老龄化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农村人口老龄化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

变量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系数	标准误	P 值	系数	标准误	P 值	系数	标准误	P 值	
人口因素	农村老年人口抚养比	0.611***	0.010	0.000	0.643***	0.031	0.000	0.504***	0.014	0.000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0.000	0.000	0.504	0.000***	0.000	0.008	0.000	0.000	0.160
经济因素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0.000*	0.000	0.064	0.000**	0.000	0.032	0.000	0.000	0.124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980	0.000**	0.000	0.026
社会因素	农村文盲率	-0.019	0.016	0.252	0.054	0.038	0.161	0.017	0.011	0.109
	农村每万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0.012**	0.005	0.022	-0.032**	0.015	0.032	0.024***	0.007	0.001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比重	0.137***	0.045	0.003	0.011	0.030	0.713	0.001	0.008	0.890
	常数	1.908***	0.319	0.000	1.131**	0.453	0.015	1.631***	0.232	0.000

说明: *、**、***分别表示 $p < 0.10$ 、 $p < 0.05$ 、 $p < 0.01$ 。

农村老年人口抚养比在三个地区均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再次说明人口因素是影响老龄化的最直接因素。农村人均收支水平代表着人均经济条件,经济条件越好,提高生活水平、获得医疗资源的能力就越强,延长预期寿命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上述两个解释变量在西部地区均无显著影响,可能是由于西部地区农村经济水平总体落后,居民人均收入偏低,消费能力较弱,追求高质量生活的潜力受到限

制。农村每万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在西部地区发挥正向作用,但是在中、东部地区却产生负向影响。对于西部农村地区来说,医疗卫生水平高,医疗服务质量好,可以延长预期寿命;而在中、东部的农村地区,医疗床位数多表明该区域医疗资源较为丰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在大城市就业压力大、生活成本高和乡村振兴成为国家发展重点的背景下,农村地区可能会吸引更多青壮年返乡,老年人口比重从而随之下降。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比重只在东部地区对农村老龄化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这是因为农村低保可以兜底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对保障农村老年人口生活、延长预期寿命起积极作用,但在中、西部地区,农村的社会保障工作仍有很大的进步空间,保障力度尚需加强。

(三) 城乡倒置度的影响因素

综合来看,人口、经济、社会因素均对我国城乡倒置现象存在显著影响,具体见表4。

表4 城乡倒置度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

变量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系数	标准误	P值	系数	标准误	P值	系数	标准误	P值	
人口因素	人口出生率	0.033	0.094	0.726	-0.184	0.112	0.100	-0.111	0.088	0.207
	人口死亡率	-1.291***	0.377	0.001	0.624*	0.356	0.080	1.027***	0.337	0.002
	老年人口抚养比	0.265***	0.093	0.004	-0.207*	0.113	0.068	0.230***	0.087	0.008
	城镇化水平	-0.079*	0.043	0.066	-0.161***	0.053	0.002	-0.042	0.029	0.144
经济因素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0.000**	0.000	0.013	0.000	0.000	0.905	0.000***	0.000	0.000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差值	0.000	0.000	0.214	0.001***	0.000	0.000	0.000**	0.000	0.019
	城乡居民人均消费 支出差值	0.000	0.000	0.607	0.000*	0.000	0.080	0.000*	0.000	0.058
	城乡文盲率差值	0.892***	0.091	0.000	0.270**	0.126	0.032	0.208***	0.043	0.000
	城乡每万人口医疗卫生 机构床位差值	0.031*	0.016	0.059	-0.023*	0.013	0.074	-0.025***	0.008	0.002
社会因素	城乡居民最低生活 保障人数占比差值	0.647***	0.193	0.001	0.238*	0.136	0.079	0.053	0.046	0.251
	常数	5.855	3.900	0.133	5.558	3.609	0.124	-4.391	2.698	0.104

说明: *、**、***分别表示 $p < 0.10$ 、 $p < 0.05$ 、 $p < 0.01$ 。

回归结果显示,人口死亡率和老年人口抚养比在三个地区均存在显著影响,而我国人口出生率持续低迷,对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无显著影响。城镇化水平与中、东部地区的老龄化城乡倒置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原因在于伴随着城镇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城乡人口结构随之改变,城乡人口老龄化差距相应缩小;而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较慢,水平较低,暂时还未表现出对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的影响。刘成坤的研究也证实了城镇化会推动老龄化城乡倒置,并且这种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在东部地区作用最显著^[15]。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居民人均收支的城乡差值均对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存在显著影响,且在西部地区表现最为突出,这说明在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经济因素是导致城乡老龄化差距的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在对城镇和农村老龄化的影响因素分别进行回归分析时,表征居民受教育程度的文盲率未表现出

显著影响,但是在城乡倒置度的模型中,城乡文盲率差值这一变量在三大地区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在东部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受教育水平越高,意味着个体追求的需求层次更高,获取资源满足自身需求的能力和动机更强,这促使大批农村青壮年人口迁往城镇,导致农村老年人口比重增加,而城镇老年人口比重相对下降,城乡倒置程度加深。城乡每万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差值在中、西部地区表现为负相关变量,而在东部地区则产生正向影响。这是由于东部地区城乡发展差异更为显著,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城镇地区,尤其是中心城市,其拥有难以比拟的资源聚集优势和人口吸引力^[17],城乡之间医疗水平的差异会影响区域预期寿命和人口流动的方向,导致老龄化城乡倒置加剧。城乡居民低保人数比值之差体现了城乡之间社会保障水平的差异,保障水平的差异会影响居民的生活水平和预期寿命以及人口转移的方向,差距越大,人口从农村流向城镇的速度越快,城乡倒置越严重,这一点在东部地区最为突出,而在西部地区,社会保障总体水平有待提高,城乡差距还未严重到对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产生显著影响。

四、研究结论和建议

(一)研究结论

基于上述实证结果分析,本文得出结论如下:

1. 人口因素和经济因素是我国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出现的主要驱动因素,这在前人的研究中也得到验证^[6],由于人口的机械变动直接或间接受制于经济因素,因此,经济因素对于老龄化城乡倒置的作用更加显著。上述三个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人口因素是影响我国人口老龄化城乡和地区差异的最显著因素,这是因为人口因素是影响老龄化的直接因素,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直接决定了人口规模和年龄结构^[18],但是近年来,我国人口出生率始终维持在低水平上,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技术的进步,人均预期寿命延长,人口死亡率在城乡、地区之间也没有表现出较大差距,人口因素中真正对老龄化城乡和地区差异产生影响的是人口的机械变动,即人口迁移^[19]。人口迁移的非自然诱因包括区域的经济水平、基础设施条件、社会保障服务、就业机会、思想开放程度、文化资源、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等,经济因素不仅是诱因之一,还直接或间接地对其他诱因产生影响,因此,经济因素是造成人口老龄化城乡和地区差异的根本原因^[19]。

2. 通过对比城镇和农村人口老龄化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相较城镇,经济发展水平、医疗卫生条件和社会保障水平对农村地区的老龄化影响更加显著。这是一个双向作用的循环,城镇经济、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优势,吸引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由农村迁移至城镇,暂时缓解了城镇老龄化问题,却导致农村老龄化现象日益严重;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程度的提高会进一步加剧农村地区劳动力的流失,使城乡发展水平的差距扩大,城乡发展不平衡加剧。既往研究也有相同发现,刘维奇认为城镇化与人口老龄化的城乡倒置具有双向影响,城镇化背景下的人口单向迁移加剧了老龄化城乡倒置,而农村的严重老龄化又限制了农村地区的发展,阻碍了城镇化进程^[20]。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于21世纪初期出现,此后不断加剧,农村人口老龄化具有程度高于城镇、速度快于城镇、地区差异大于城镇、老年人口多于城镇等特征^[10]。社区居家养老已经在城市养老服务中占据重要地位^[21],而农村养老方式仍以传统的家庭养老为主,但是随着青壮年人口外溢,农村家庭规模朝小型化方向发展,代际关系渐弱,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家庭养老方式难以为继^[20]。在此背景下,农村地区留守老人照料问题尤为突出,养老压力巨大。

3. 统筹分析三个模型的回归结果,发现人口因素对我国东、中、西部的城乡人口老龄化均具有显著影响,而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影响各异。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在我国具有普遍性,表现最为突出的地区位于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地,而程度较低的地区则以东北、西北、西南片区为主^[11]。我国国土面积辽阔,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经济发展水平高、基础设施完善的地区城镇化水平也较高,城乡差距更为突出,由人口乡-城转移造成的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随之加剧。人口的迁移不仅在城乡之间进行,还跨省份、跨地区进行^[22]。目前我国的青壮年人口为了获得更好的就业和教育机会,普遍倾向于去往大城市发展,在地域上表现为从西部地区向中、东部地区迁移^[23],或者从中部地区迁往东部地区,造成区域之间年龄结构的差异。与青壮年人口的流动方向相反,既往研究已经证明我国的老龄化城乡倒置最先出现在东部沿海地区,然后逐渐向中、西部地区扩张^[6]。考虑到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差异,东部地区应当促进老年人口的社会参与,丰富其物质和精神生活,而对于中、西部地区的老年人,则应更加关注其生活保障和养老服务体系^[24]。

(二) 政策建议

1. 落实生育支持政策,缓解人口压力。我国生育率持续低迷,人口已经出现负增长,低生育率与高度老龄化并存,为社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为此,应当出台并落实相应的生育政策,构建起由政府主导、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生育支持体系^[25]。保障女性合法就业权益^[26],大力发展托育机构^[27],通过发放生育补贴减轻育龄家庭的经济压力,以此促进生育意愿的释放和生育行为的落实。

2. 破除城乡壁垒,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经济因素是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最根本的影响因素,为此,应以乡村振兴为契机,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28],打破城乡发展不平衡和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的恶性循环,并以经济发展为基础,提升农村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水平,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与公共服务设施均等化^[29],减少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农村地区不具备发展工业的基础设施和人才资源,但是可凭借生态环境优势发展生态农业、乡村旅游、健康疗养、乡村休闲养老^[30]等产业,或者因地制宜,依托当地特色资源发展特色产业,如依托红色文化,发展红色文旅产业^[31],为当地的青壮年人口提供更多的就业、创业机会,减少人口流失。在提振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引导就地城镇化、就近城镇化^[19],既可以减轻农村地区的人口老龄化压力,也可以助推我国的城镇化进程。

3. 完善农村地区的养老服务建设。在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的背景下,农村地区的养老压力尤为突出,政府应当予以更多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首先,建立以家庭养老为主、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9]。基于现实养老压力和文化传统,家庭养老仍是核心养老方式,可通过村规民约、道德约束、司法干预等方式,鼓励、督促子女对老人进行物质上的赡养和精神上的慰藉;在延续家庭养老功能的同时,增设多样化的农村养老机构作为补充。其次,增加财政投入,完善农村地区养老基础设施的建设,满足老年人口的医疗、娱乐、文体、社交、购物、生活服务需求。再次,健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32],扩大农村新型养老保险的覆盖面^[33],以减轻养老压力。最后,加大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力度^[34],完善社会救助的目标识别,提高救助标准,重点关怀“低保”、贫困、失能、失智、独居、孤寡老人;对于这些老人,社区应积极介入,必要时可提供养老服务机构的托管服务。

4. 协调区域发展,统筹合作共同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城乡倒置问题。人口老龄化是我国各地区面临的共性问题,老龄化城乡倒置也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因此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应当打破地区分割的壁垒,寻求区域之间的联动与合作^[35]。东部地区具有完整的产业链,可为劳动者提供多样化的工作机会,因此吸引了大量青壮年人口。但是随着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东部地区的人口吸纳能力将趋于饱和,就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而中、西部地区尚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可以与东部地区开展合

作,充分利用低成本优势,引进适宜当地发展的相关企业,由东部地区提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统筹、协调区域发展,发挥各自的优势,减轻中、西部地区的人口流失现象,缓解东部地区由于人口超负荷造成的压力。

[参 考 文 献]

- [1] 陆杰华,刘芹.中国老龄社会新形态的特征、影响及其应对策略:基于“七普”数据的解读[J].人口与经济,2021(5):13-24.
- [2] 孟向京,姜凯迪.城镇化和乡城转移对未来中国城乡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J].人口研究,2018(2):39-53.
- [3] 朱勤.城镇化对中国城乡人口老龄化影响的量化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14(5):24-35+126.
- [4] 刘华军,刘传明.城镇化与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双向反馈效应: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联立方程组的经验估计[J].农业经济问题,2016(1):45-52+110-111.
- [5] 杜鹏,王武林.论人口老龄化程度城乡差异的转变[J].人口研究,2010(2):3-10.
- [6] 张伟,蒲春蓉,黎芳,等.中国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驱动机制[J].热带地理,2021(5):928-942.
- [7] 陈明华,郝国彩.中国人口老龄化地区差异分解及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4):136-141.
- [8] 亓广志,王志宝,赵娜娜.黄河流域人口老龄化时空差异及驱动因素研究[J].西安理工大学学报,2022(3):301-310.
- [9] 童玉芬,李玉梅,刘传奇.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城乡人口老龄化趋势及政策启示[J].人口与经济,2014(6):12-21.
- [10] 林宝.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普遍性与阶段性[J].人口研究,2018(3):38-50.
- [11] 许昕,赵媛,夏四友,等.中国分县城乡人口老龄化时空差异与机理[J].经济地理,2020(4):164-174.
- [12] 李辉,王瑛洁.中国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研究[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1):154-158.
- [13] 李汉东,赵少波,王玺,等.中国老龄化区域差异和变化趋势预测[J].统计与决策,2021(3):71-75.
- [14] 郭远智,周扬,韩越.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时空演化及乡村振兴对策[J].地理研究,2019(3):667-683.
- [15] 刘成坤.中国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的时空演变趋势及影响因素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21(12):31-45.
- [16] 朱健,徐雷,王辉.人口城镇化发展与城乡人口老龄化的互动关系[J].经济地理,2018(10):89-98.
- [17] 刘涛,卓云霞.中国县级人口变动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新探索[J].人口研究,2022(6):72-87.
- [18] 吴媛媛,宋玉祥,于婷婷.东北地区人口老龄化空间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J].东北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2021(3):139-146.
- [19] 吴媛媛,宋玉祥.中国人口老龄化空间格局演变及其驱动因素[J].地理科学,2020(5):768-775.
- [20] 刘维奇.中国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现状及其与城市化的相互影响[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4(2):134-139.
- [21] 肖云,随淑敏.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质量研究:以重庆市6个社区为例[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95-106.
- [22] 马胜春.中国省际人口流动的特征及影响因素的空间分析[J].人口研究,2022(6):59-71.
- [23] 王录仓,武荣伟.中国人口老龄化时空变化及成因探析:基于县域尺度的考察[J].中国人口科学,2016(4):74-84+127.
- [24] 刘文,杨馥萍.中国积极老龄化发展水平测度:基于东中西部地区和28个省市的数据研究[J].人口学刊,2019(2):100-112.
- [25] 尚子娟,郑梧桐,石智雷.三孩政策背景下生育支持的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基于生育配套政策试点项目的案例分析[J].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6):83-92.
- [26] 风笑天.三孩生育政策与新型生育文化建设[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1):98-105+2.

- [27] 王军,王广州. 中国三孩政策下的低生育意愿研究及其政策意涵[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2): 201-212+217.
- [28] 黄宗晔,赵晶晶. 如何享有平等的晚年?:养老金与老年人的城乡收入差距[J]. 人口与经济,2022(2):74-86.
- [29] 钟睿. 我国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的空间转移和规划应对:基于人口流动的视角[J]. 城市发展研究,2019(2):24-30.
- [30] 周鹏飞,杨欣炼,沈洋. 老年人乡村休闲养老意愿影响因素实证考察:以重庆主城都市区为例[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1):66-76.
- [31] 尚子娟,任禹崑. 乡村红色文化与旅游发展模式探析[J]. 学术交流,2021(4):111-122.
- [32] 李静,吴美玲. 中国城乡人口老龄化发展质量:差异和预测[J]. 宏观质量研究,2020,8(5):1-13.
- [33] 伍海霞,宋健. 中国农村老年人养老规划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西北人口,2022(1):88-99.
- [34] 王健,赵凯. 中国城镇化、老龄化、城乡差距与经济发展研究: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J]. 当代经济管理,2020(7):49-58.
- [35] 吴连霞,赵媛,吴开亚,等. 中国人口老龄化区域差异及驱动机制研究[J]. 地理科学,2018(6):877-884.

Analysis of Urban-Rural Differences in Population Ageing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in China

Shang Zijuan¹ Chi Baihui²

(1. School of Marxism,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Shanxi 710064;

2. School of Humanities,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Shanxi 710064,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the disparity in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gions has caused a significant overflow of rural residents, an aging rural population, and the phenomenon known as urban-rural inversion of population aging. The one-way cross-regional movement of people has contributed to both the rural-urban population transfer and a significant regional age structure imbalance in China, which is a danger to the country's long-term economic and social growth.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1 provinces from 2010 to 2019, we build fixed-effect and random-effect models with the population aging coefficients as the explanatory variables to investigate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population aging and the phenomenon of rural-urban inversion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of China, as well as the performance of the three types of factors in the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demographic, economic, and social. The results show that demographic factors are the direct cause of urban-rural differences in aging, economic factors are the root cause, and social factors such as education, medical care, and social security have different effect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regions. As a result, the government should improve fertility assistance to raise fertility rates, promote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stimulate the creation of elder-care services in rural regions, and promote regional connectivity and collaboration.

Keywords: population aging; urban-rural inversion; influence factor; empirical study

[责任编辑:左福生]